

## 父 亲

坐在逆行的车座上，在我的感觉里，即使列车在向前行进，也似乎并不是南下而是正在北上。火车过了长江大桥，过了南京，进了山洞。车里突然暗了下来，尽管有微弱的灯光；但一霎时又是满车阳光了。

就在这从亮到暗，从灯光到阳光的变换里，有什么东西在我心头触动了一下，不知怎的，在上海读书时每逢寒假到南京去看父亲的情形，又重新浮了上来。

父亲故世已经三十四个年头了，但他那坐在书桌前默默抽烟的神态却经常跟着我在各处跑。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的一个凌晨，在上海一处八层的高楼上看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我高兴得流了眼泪；但我那时想的则是“如果父亲还活着……”，须知那时他死了还不到半载！

他在病床上整整躺了一年，到淮海战役捷报传来时，他已经每天便血喊肩胛痛，睡不好觉也吃不下饭了。不过每天我到医院去看他时，他总要问我新华社广播了什么好消息。那天我把淮海大捷的战讯告诉他，他那张已经十分瘦削的脸上露出了笑容，随即又低沉地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江，我能看到解放军过江就好了，但愿……”于是他凄然一笑，便躺下身来，挥着手说，“你回去吧，我今天很好。”我含着泪离开了病室。

他每天都对我说，“我今天很好。”而他的病情却越来越严重了。他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凌晨，离透视发现他是肺癌，不过三天就去世的。临死前他神志还很清楚，嘴唇蠕动着，可是已经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他说了些什么呢？还是那句“我能看到解放军过江就好了”的话吗？

母亲生我那一年，父亲整三十岁，母亲产后一个月，便因产褥热不治故世了。父亲很伤心，不愿再在杭州老家生活下去；他是留学日本学铁道工程的，便到北京京张铁路工作。以后又去江西修南浔铁路，到北京交通部当京官，然后又到粤汉铁路。总之，他很少回家，只有一九二六年

他在浙江省道局工作时，才在老家住了一年多。以后患了咯血，差一点死去。病好后就到津浦铁路改行当审计人员了。因此我对他很陌生。

他在杭州的一年暑假里，一查我的功课，什么都过得去，就是代数刚刚及格，因此在暑假里规定由他自己给我补习。父亲是工程师，靠计算吃饭；母亲在日本学师范，回国当了数学教师，也整天与数学打交道。要是根据血统论，则我一定可以成个数学家，可叹的是我有各式各样的爱好，脑细胞里唯独缺少数学的因子；宁愿热得满身大汗和表兄表姊们玩“官打捉贼”，也不愿坐下来解一个方程式。父亲气伤了心，但也无可奈何。后来他病了，暑假也过完了。一直到考大学时，我就吃了数学不及格的亏，进不了我日夜想念的清华大学，然而懊悔已经太晚了。

这一次是我一生和父亲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最长的日子。以后他尽可能一年回杭州一次，总说来休假，事实上则是请了假来看我这个不肖子的。等我到上海读大学，他那时已经在南京津浦铁路做事，根本连杭州也不去了。

我和父亲虽然见面不多，但他的爱子之心则

是很强烈而且是超乎一切之上的。有件事是最好的证明。我快九岁时，忽然家里人说父亲娶了位继母，马上要在暑假里回杭州来了。果然我放暑假没几天，父亲带了继母回来了，住了一个多星期，父亲又回九江去，而继母便在家里留了下来。我的一位表姊告诉我说父亲曾经决心不再结婚，但是现在祖母死了，没人照顾我，所以改变决心续了弦。回想那些日子我是多么高兴，父亲回来了，还带来了一位继母！我祖父母喜欢孩子，我的表兄表姊共有八个，他们都住在我家里，另外还有一个堂姊和一个堂弟。他们都有母亲，唯独我没有。听他们“妈妈”、“妈妈”叫得欢，不免心里艳羨。姑母们怕我不好受，谁都要我叫她“干娘”（杭州人对姑母、姨母的爱称），那也不过是嘴上热闹而已。祖母疼我这个独根苗，但她去世得早，由两个表姊带管着我。她们也大不了我多少，恋爱、结婚够她们伤脑筋的。所以父亲在续弦时，事前就说明有个儿子，需要她抚养成人。

继母出生于南昌的一家破落户，虽属名门，式微已久，知书而不识理。每天不打麻雀牌时，便手捧《红楼梦》；还以为一朝嫁人，夫婿须要赡养

她的全家。可是又死爱面子，不说她要钱接济娘家，反而造出种种理由，说我要衣服鞋袜，还因为我自幼身体孱弱，每日需吃营养品。拿这些理由，一封封信给父亲要钱。父亲起初是有求必应，但后来起了疑心，因为衣服鞋袜和牛奶鸡蛋究竟所费有限。所以有一天，他趁公差之便，突然回到家里。

到今天，我依稀还能记得那一个对于他十分难过的下午。我正在布满暮色的后轩（那是一家人吃饭的地方，就在大厅背面）里做作业。大门响了，不一会我忽然看见父亲走了进来。他一边拉住我的手，一边端详着我，接着他就走上楼去。继母不在家，出去打牌了。我听见楼上有移动箱筐的声音。过了一会，父亲在叫唤我，我便跑了上去。

只见父亲呆呆地坐在我的衣箱旁边，箱盖打开着，一旁堆着我的衣物：一套发了霉的棉衣裤，几件夹衣衫，几件长褂，几套短衫裤，此外便是前穿后通的一堆破烂袜子。父亲阴沉着脸问我，这是你平时穿的？我不敢直接答复，只道妈说过过年时再给我做新的。

以后的事，我现在已记不清了，就是在当时，我也没有弄明白过。只是几个月后，父亲又来了一次杭州，接着继母便回江西去了。表姊们告诉我说父亲和继母离婚了。这消息并没有使我吃惊，相反倒有些释然之感。

我自幼丧母，虽然祖母视我如瑰宝，但终究不是母亲。任何孩子，即使他挨了母亲的打，也比我这个没有母亲打的人日子好过，何况祖母也早已去世了。继母来了，我满心以为我可以得到一个爱我疼我的人，我可以随便对之撒娇撒野的人。可是这个梦，还没有等送她来家的父亲离去，就完全破灭了。继母的理由是我已经是个大孩子，应当立规矩，不该再“纵容”我，因此在她看来，我一身无一是处。从此我和她之间，隔了一重厚壁。这重厚壁，便是她经常虎起的面孔。她给我立的什么规矩呢，别的不说，只说晚上非等她麻雀牌打完，才让我跟着她上楼睡觉，因为她怕我从床上滚下来。我就在牌声和赌徒的喧嚣中，做我的数学习题，背诵我的课文。我一生从来没有赌过，麻雀牌的技巧我一窍不通，而且深恶痛绝，也许和我当时的处境，不是没有关系的。

我怕继母，尽管她没有打过我一下（她不敢如果没有家里的其他人，我想她早就不会饶过我的），可是少不了责骂。我有差错是责骂，我没有差错也是责骂。甚至她在牌桌上输了钱，也要对我唠叨一番，说是我搅了她的手运。

父亲并没有向我提他离婚的事，只是他自己照顾了我几天之后，便把我托给我母亲生前的寄姊家里去生活了。一直到三十年代初，有次我到南京去过寒假，他才和我提起这件事。他一个人住在南京庐政牌楼大同公寓，过着老鳏夫的孤寂生涯。早上天不亮就起来，匆匆摆渡过江到浦口津浦路局上班。晚上下班回来，有时和朋友们去听听戏，吃吃小馆子，有时候便一个人在寓室里，闷头在昏暗的电灯光下看书。他喜爱文学，有时也喜欢诌几句诗，当时上海出版的文学刊物塞满了他的那间斗室。

有一天黄昏，他带了我到夫子庙去吃了顿晚饭，两个人喝了些酒。回到公寓里，他在灯下默默地抽着雪茄烟，不时抬起眼来瞅我一下。我发现他的神情有些不平常，便说：

“爸，你有事要讲吗？我听着，你烟抽得太凶了。”

父亲又抬头望了我一眼，慢吞吞说：“三舅和四舅都劝我再结婚，说我老了，需要有个老伴，一起生活有个照应。可我想来想去，总觉得还是现在这样一个人生活的好，过惯了也就无所谓了。而且再和一个人结合，会生出多少事来！我没有忘记当年为了你还小，需要有人抚养，才再结了次婚。但我没有选好适当的人，使你受了委屈，我对不起你的母亲。而现在你已经成年了，再过两年大学毕业，你能够建立自己的生活，我也了却一桩心事，我又何必自寻烦恼呢？”

其实，要父亲再结婚有个老伴，是我和四舅商量后，请三舅四舅提出来的。父亲是个木讷而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尽管他的脑筋非常灵敏，有时他可以从你的神态与语言中探知你隐藏在背后的东西，但要我这个疏鲁的人透过他那副眼镜片去摸索他的灵魂，真是难上加难。说实在的，即使他一辈子没有对我一次疾言厉色，而且我还能从他平时若有所思的对我的注视，看到他对我不用言语的爱抚，我还是有点害怕他的。也许这只是由于小时候表兄妹们常常用“小胡子（指我的父亲）来了”，吓唬我有关。说来说去，这种陌生

感是因为我从小没有长期和他在一起造成的。

我说，“这话是我向四舅提起的，我不知道大学毕业后会有怎样的生活，你这样一个人过日子，我觉得难受……”他听我声音变了，便说，“以后再谈吧……”我说，“既然开始了，就谈下去吧。”于是他讲了许多不再结婚的理由，我讲了许多他必须再结婚的理由，谈到隔邻人家鸡叫，也谈不出个所以然来，事情也就这样搁下了。

抗战军兴，国民党蒋介石弃南京不守而奔武汉。父亲工作的津浦路已完全沦入敌手，就此把员工全部解散，我父亲也因为肺病复发，辗转回到上海。他到沪时，我已决定去香港，便租了间屋子把他安顿好，自己则上了旅途。

父亲在上海租界里过起文字生涯来了。他不时为一些抗日的报刊写些掌故一类的文章。以后他在一个朋友开的小银行里找了个工作，日子也还凑合。太平洋事变后，他工作的银行关了门，我在重庆很久以后才知道，幸而我不时托人带些钱接济他，生活得以度过。胜利后，我回到上海，他已住在我的一个亲戚家里，每天给孩子们补课。那时我多么想找到几间房子和他住在一起，

可是国民党劫收的房屋我没有资格去享受，而出钱顶房子，又一无黄金二无美钞。我实在愧见我的老父，因为我自己一家四口还是临时住在岳父家的。父亲似乎早已见到我的苦衷，到一九四七年冬天，他不动声色地写信给我杭州的一位寄姊，要到杭州去卜居。杭州的阿姊当然欢迎，等我知道，他们已一切安排好了，要我做的大事，便是把父亲送到杭州去。

父亲说了许多理由。说年老了，苦于上海的烦嚣，所以要到杭州去住，可以清静些，在西湖边徜徉终日，也对他的肺疾有所帮助，他越是谈他的理由，我越是增加自己的负疚心情。我没有一处自己的家，我拿什么理由来留他！他在杭州住不上半年，还是回到上海来了。我岳母看我找不到房子，不能一家团聚，而终日快快不乐，便收拾一间屋子出来，给我父亲住。但他在这儿也不过住了一冬，之后便因肺疾复发而进了医院。

不过，虽然仅仅是一冬，由于朝夕相处，我们父子之间的了解，倒也日益加深。当时他和我谈得最多的是解放战争的形势。父亲的思想，照他的年纪和所受的教育来说，作为一个旧民主革命

时期的老知识分子应该说是很开明的。他年轻时参加过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大革命时期他参加过国民党，但是在济南惨案，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山东，残酷杀害中国的外交特派员蔡公时（现在的年轻人恐怕不会知道他是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剜眼割舌凌迟而死的）后，他从此便看不起蒋介石。他那时因为懂日文，临时调到蔡公时那儿当随员，负责交涉济南青岛铁路通行的工作。济南惨案发生，他仓促撤退回来，看见蒋介石那种无耻投降的行径，他上书力争，可是谁也不理会他，他写了多少字的意见，退回来时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他悲愤之余，便辞职不干。一直到全面抗战，胶济铁路的权益，也没有从日本人手里拿回来。

抗战胜利，沦陷区的人民，怀着满腔爱国之忱，欢迎国民党归来，但他们所得的只是又一次洗劫，国民党反动派的作为并不下于日帝。我父亲也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些认识。到一九四八年时，他已经完全寄厚望于解放大军了。国民党的报纸从来都是“胜利”的消息，从前线逃跑曰“转进”，失掉城市则曰“战略撤

退”，如此等等。父亲每每看到这些大标题，便冷冷地说，“又吹牛了，也不怕脸红。”解放战争中的重大胜利和消灭蒋介石的有生力量使他高兴，对共产党的指望也就更强烈。他在病榻前曾经说过，我从年轻时就希望有个强大的中国，不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民主自由的中国，同盟会给我失望，国民党也给我失望，现在只能寄希望于共产党了。这种对中国共产党的朴素感情，我想正是那些在大陆解放前夕，拒绝跟国民党到台湾或远离祖国的爱国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深为遗憾的则是父亲既没有亲见上海的解放，也没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如果他还在世上，他一定会欢欣鼓舞的。他那种对党和对中国解放事业的心向往之，纯粹是他把推翻帝制后，逐个时期比较辨析的结果，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这种感情是原始的，但也是诚挚的，可惜他活在人世的年月太少了，死时不过六十几岁，照现在的说法，他还不算太年老啊！

如果他还活在世上，他一定会对我说好好干吧，你的日子比我处得好。而现在我已经超过父亲的寿命，我当然还要干，而且还要对我的儿孙

辈说，好好干吧，你们的日子比我处得更好。

想起父亲，我没有悲哀，只有负疚和歉然之感。我总在心头说，要是我能使他辛苦了一辈子的晚年过得稍稍顺畅些，早有个落脚的窝，他一定不会那么早死去，而看不到光辉的今天的。这真是昊天的遗憾。

一九八二年十月 无锡—北京

## “后市街”的童年

一个人少小时做着向往于未来的白日梦，到老了萦绕于心头的却是以往的岁月，随着自己年龄由“而立”到“不惑”，由“知天命”到了“花甲”，最后则进入“古稀”……少年时的白日梦已不复再现，经常想起的则是对过去岁月的怀念，而感喟于老之已至，来日无多了。这是一条自然的规律，虽欲强学少年，亦不可得。譬如我如今经常想到时刻盘踞在心头的，便是我出生的那条后市长街。

幼时很纳闷为什么要叫这条街为后市街，以后懂事了，才知是与前街的繁华地区相对称的。随着杭州的古老历史，便是后市街前面的繁华地段，这也是一条长街，从清和坊、保佑坊、三元坊到羊坝头。这三坊一头连贯成一条大街，正是商贾云集，几家老字号的大店铺都设在这条街上。

但那又是幼小时的禁地，我的活动范围就被限定在后市街北起羊坝头南到甘泽坊巷一带，我的出生地王衙弄适在这两头的中点。其他地区对我来说都是十分神秘的，尤其是我的幼小心灵总想跳出这个人造的圈子，一睹那条繁华的街市。奈何一道道高耸天际的风火墙，竟使我终日盘桓在狭小的世界中。

我的童年一直十分落寞，因为我一下地就失去了母亲，由祖母抚养大的。开始我连王衙弄口也不准去，要去就得由乳母或几个表兄姊陪着；以后上学了，虽然学校离家不过咫尺之遥，但也要由乳母接送。毕竟学校是个新天地，不过每天来往在一条路上，总不能称我的心意。所以我一放学在家放下书包，便泥着表兄姊到王衙弄口去瞧热闹，不过这个热闹也是十分可怜的，因为后市街既然较为隐僻，过往行人左右就是住在这一带的几张熟面孔。可是我珍惜在这弄口伫立的时光，因为我可以看见不同的脸，舒坦的，焦急的；走路的姿势亦有所不同，有人安详踱步，有人匆匆而过。路人的不同姿态使我生出不同的遐想，为我做白日梦增加资料。

当然这些过眼烟云，今日我早已十分淡薄，很难具体想起来了。不过也有几件大事，为我所不能或忘的，而且都与我就读的初级小学有关。这个小学就设在后市街的南首，离我家只有五分钟路。我记得那时既喜欢学校生活，又嫌弃它太接近家门；既欣喜它允许我进入另一处天地，又讨厌这个学校不能使我跳出这条街。我总是遇到常见的人和事，没有一点新鲜感。因此我常常身体坐在课室里，心早已飞到王衙弄外这段方寸之地了。

小学的事在我记忆中难免淡薄，唯一时常涌上心头的，一次是学校远足到城隍山（吴山）。此山名为山，不过是个较高的丘陵而已，离我学校也不过几十分钟的路程，然而对我却成了一件大事。不但我这样认为，连我祖母也把它当成一件大事。不用说行前几天我的兴奋心情，甚至到去的那天离家之前，祖母还千叮万嘱，一切小心！我足虽未跨出门限，心却早奔向城隍山了。我带了一个纸鸢去，不料在山上空地放鸢子的时候，失足跌了一跤，腿上擦破了一点浮皮，回家后这便成了一件更大的事。祖母是信奉神佛的，杭州

习俗小孩子在家外摔跤必要惊魂落魄；所以天黑后她老人家便让我乳母去后市街一路为我叫魂。此事成为同学中的笑柄，使我好几天抬不起头来。

一次是孔老夫子生日，孔庙举行祭孔仪式。看那些年长的同学穿起道袍，戴着插有长雉鸡毛的道冠，在锣鼓齐鸣、清音袅袅中载歌载舞，煞是好看；最后还每人分到一块冷猪肉。这是杭州最后一次的祀孔，以后学生除了列队去行鞠躬礼外，便什么也没有了。但是我对于祭孔的穿道袍戴雉尾帽载歌载舞，兴趣特大，回家后便和几个表兄姊们依样画葫芦，玩了好几天才玩厌。

再一次是同学中有位商务印书馆经理的孩子，他邀我到他家店里去玩。下了课，我就跟着他去了，一玩便玩了一个时辰，兴未尽而不得不回家；因为事前我没有和家里讲，否则我就玩不成了。这时家里已闹翻了天，派人四出打听，怕被拍花的人拐了去。祖母则在后轩坐在椅上拍桌捶胸，口里叫着早夭哥哥的名字，说他死得早，如今又走失了我，叫她如何向我父亲交待。看见